

长三角摆脱 GDP 偏好集体求“慢”

经历了三十几年的高歌猛进后,“强劲发动机”开始减速,从今年两会传递出的信号显示,长三角开始主动“求慢”,对经济增速“踩刹车”谋求转型。

以上海为龙头、与江苏和浙江一起构成的中国长三角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跑者”,被称为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动机”。

长三角的“领头雁”上海市一直是经济高速增长城市的代表,但是 2012 年经济统计数据显 示,上海的 GDP 增速 7.5%,近年来首次跌破 8%,这个数字甚至也低于当年全国平均 7.8%的增速。

GDP 经济指标从“领跑”转入“落后”,上海官方如何看待?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开放日上,对于上海去年 GDP 增速落后于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有可能“垫底”的提问,上海市市长杨雄回应说,虽然上海的发展速度放缓,但这恰恰可以让上海摆脱 GDP 的偏好,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上海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

除上海主动降速摆脱 GDP 偏好外,江苏和浙江也不约而同地调慢速度。在江苏省的“十二五”规划中,GDP 增速目标确定为年均 10%左右,这个速度比“十一五”时期下降 3.5%;浙江省的“十二五规划”GDP 增速也跌破两位数,调至 8%。

降速是为了转型,对急行军式的发展道路审视后,长三角决策者已经意识到改革转型的紧迫性。

“上海关键要走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路。”杨雄表示。这位新市长介绍,虽然 GDP 增速放缓,但因为转型发展,目前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 60%,减少了对投资、房地产、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

江苏省省长李学勇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的开放日上面对媒体“江苏财政收入增速放慢,钱不够花”的提问时表示,“江苏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

这位省长没有提及用 GDP 增速带动财政收入,他希望推动江苏经济的升级转型。对于长期高速奔跑的长三角把速度主动调至“慢”频道谋求经济转型,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主动降速是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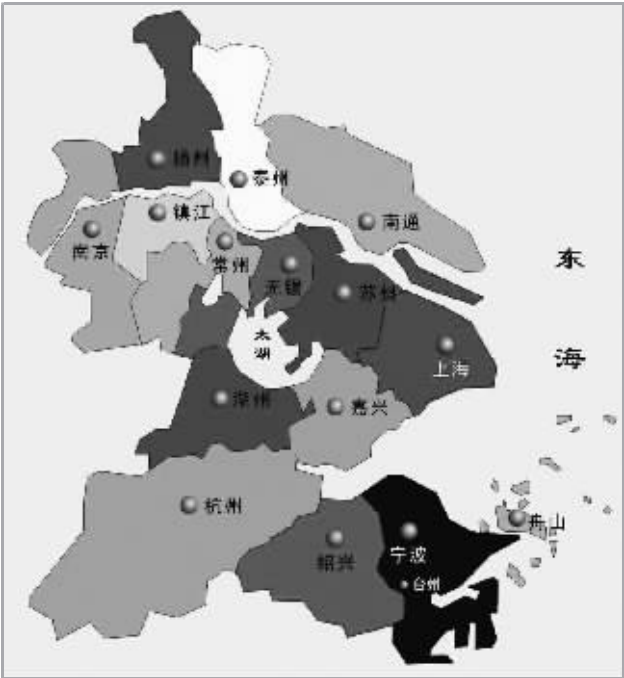
他认为,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GDP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总量,但却不能完全反映产业结构、能源消耗、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认为,在保证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调低 GDP

速度,对经济进行转型调整,为江浙沪的未来经济提供了一个可“回旋”的余地。

“决策者摆脱了速度就是政绩的想法,雾霾天也能少一点。”王战说。这位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建议,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将是长三角放慢步伐之后,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黄奇帆推动智慧型“山城特色”改革

开放市场能量推动智慧型“山城特色”改革——新华网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市场经济中的太多课题需要我们动脑筋:不是依靠国家拨款,而是利用改革产生的生产力实现财富增加;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日前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说,未来重庆将开放市场能量,进行巧实力、智慧型改革,形成“山城特色”的重庆改革。

探索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世界性课题。近年来,全国各地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开展城乡一体化探索。

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特殊直辖市,城乡区域差异很大。“真正要把重庆城乡统筹好,需要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黄奇帆说。

近年来,重庆积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人口转移流动“五个一体化”,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体系,养老、医疗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文化服务更趋均衡。

“我们解决了从无到有,但目前只是低水平的覆盖,”黄奇帆表示,还要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实现高水平全面覆盖。

黄奇帆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矛盾在于城市市农村资源不能相互流动。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之间资源要素互通和一体化至关重要。

2009 年,重庆着眼于构建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开展了“地票”交易的探索:先把农村闲置的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地票形式到农村交易所公开买卖。交易收益扣除复垦成本后,85%补偿农户,15%给集体。

黄奇帆说,地票的探索能带来五个好处:一是地票实行耕地先补后占,可有效保护耕地;二是盘活农村闲置和低效使用的建设用地资源;三是有效补充农村危旧房改造、沉陷区农房搬迁、地质灾害搬迁等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四是为进城农民提供原始积累;五是促进农民集中居住。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激活农村劳动力、土地、金融等要素资源,构建城乡要素合理流转的制度通道,”黄奇帆称,通过制度性安排,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以期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中国农民穷,穷在除了靠双手双脚的劳动收入外,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黄奇帆说,目前农民 97%的收入是劳动收入和政府补助,财产性收入低于 3%。

重庆农村金融不活跃,关键在于农民没有抵押物做信用基础。黄奇帆表示,银行不给农民发放贷款,大量农民每年产生的几千亿储蓄全提供给城里人使用,而农民和农村没有从中获得利益反哺。

为突破这一瓶颈,重庆从 2010 年起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三权”抵押融资试点,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农民意愿,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流转或交易。

试点开展以来,重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累计达到 310.7 亿元,不良贷款率不到 1%。2015 年,“三权”抵押融资规模有望达到 1000 亿元,届时可增加上千亿元农业销售收入,使重庆农业产值翻番。

“让城乡金融、土地等要素流传起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黄奇帆说,这将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城镇化:“农民工进城而不是农民进城”

“农民工进城,而不是农民进城。”黄奇帆说,把农民简单变成城市人口是不科学的。

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大量农民工补充。

黄奇帆表示,城镇化进程的本质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一个过程。“辛辛苦苦在城里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却不能在城里真正安居,跟城市终生无缘,这不公平。”

2010 年,重庆启动了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允许在城市工作生活一定年限的成熟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目前,重庆市累计有序转户 359 人。

黄奇帆认为,推动城镇化能改善农民工待遇,善待农民工是管理者的良心;其次,能增加内需。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一年人均增加一万元消费;再次,城镇化也能带来生产力的变化。

户籍制度改革搞得好,会延长中国人口红利 15 年。黄奇帆说,中国目前 51%的城镇化率只是

一个虚数,至少达到 70%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才会进入拐点。

开放市场能量推动智慧型“山城特色”改革

“花钱搞投资,谁都会干,资金总是供不应求。也不能完全依赖中央来推进发展。”黄奇帆说,改革是一切发展的龙头,加速发展最重要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通过机制体制改革,开放市场的能量。

黄奇帆说,市场的力量无穷无尽,用生产关系调整来促进生产力,是巧实力、智慧型改革,也是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

“现在我们要动这方面的脑筋,不仅靠货币投资产生增长,而要靠生产关系调整来提高生产力。”黄奇帆说,这种改革产生的生产力在实现财富增加的同时,没有投入反而吸收了货币,能使中国经济实现既好又快的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奇帆认为,衡量是否实干的标准,在于是否围绕问题抓发展,是否能够在发现问题中解决问题,是否按照市场化规则推动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说起改革只知道跟国家要钱,但凡这样的管理者都是懒汉,”黄奇帆说,真正的改革应该是一个用个巧办法、一个好主意实现共赢,没给国家添麻烦,也没给国家制造通货膨胀。

关于重庆改革的难点,黄奇帆表示,重庆最困难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问题。“70%的路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山沟间修路成本很高。”

改革就是从难点突破。近几年,重庆大力发展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地铁投资已超过 700 亿元。

黄奇帆说,重庆是山城,山上盘旋的都是小立交公路,路与路之间被山山水水切割开来。如果没有桥梁、隧道、地铁联通,就没有一个城市的经济,而只有小山沟的经济。

“当你把地铁、隧道、高速公路建造好,就会形成城市经济集聚体,整个城市既优美又轻松,”黄奇帆表示,基础设施的弱点反而变成了重庆的特色。

“这就是智慧型改革,围绕本地区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中央一直以来都在调动全国千百万干部巧思考。黄奇帆说,重庆各部门、各地方的政府官员要有科学、智慧执政的悟性和能力,抓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遵守市场规则,释放改革“红利”,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山城特色”的重庆改革。

(来源:新华网)

在城镇化趋势推动下,智慧城市的建设再次受到关注。随着住建部将公布第二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消息发出,不到 3 个月的时间,我国已经公布了 140 个试点城市,正式开启我国智慧城市的新浪潮。

在国家政策与运营商规模建设的推动下,我国智慧城市开始实现长足发展。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国计民生中的热点领域,并逐步向老百姓的医、食、住、行、游、教等方面渗透。然而思路的不清晰,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模式,也成为了我国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业内专家呼吁,国家应做好顶层设计,稳步推进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

●政府主导加速项目“落地”

智慧城市的快速建设的背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逐渐重视,加大了扶持力度,同时宽带、物联感知、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也开始高速发展。在中央方面,工信部先后在扬州、常州进行试点,还与浙江省签署了智慧城市部省合作协议,并还组织落实了中欧绿色智慧城市项目。科技部也牵头成立了中国智慧城市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在一些地区,智慧城市已经步入了实质推进阶段。比如,最新消息,由北京市政府和相关卫星导航企业共同投资 3 亿元人民币的北京市北斗公共平台,2013 年开始建设。作为中国内地首个已经落实的为智慧城市服务的北斗平台,它将立足北京、服务全国,为智慧城市提供政务管理、行业应用和民生服务。

今年,哈尔滨市也计划投资 10 亿元,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扩大公共热点区域 WiFi 网络覆盖范围,加快编制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推进“智慧松北先行示范区”等重点项目建设。

湖北省也即将启动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工作,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让试点城市居民由此获得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食品药品管理等方面的便捷服务。

●运营商提速智慧城市规模建设

“智慧城市”战略的实施意义重大,而作为智慧城市各个项目实施的基础,城市各个区域的高质量宽带网络至关重要。

运营商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者,自然是智慧城市推进的主力军,智慧医疗、智能交通、智慧农业等众多行业应用均离不开运营商的支撑。

近期,浙江省政府与工信部、国家标准委、环保部、水利部、卫生部、国家旅游局等部委以及国家电网公司等央企合作签署六项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项目合作协议,力推智慧城市的建设,其中三大运营商将继续积极参与浙江智慧城市建设工作。据悉,三大运营商将作为合作主体参与了智慧城市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推进相关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务模式创新、运营服务、人才培养等基地的“落地”。

还有,广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签署合作协议,将在 2015 年前将投入超过 200 亿元,建成全国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 TD-LTE 网络,实现广州 10 区 2 县级市 TD-LTE 信号和 WIFI 信号的全覆盖,为智慧广州提供多层次、立体化、高带宽、全覆盖的无线基础网络。

琼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海南公司也于近日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合作在 5 年内打造“数字琼海·智慧城市”。两方将在 5 年内,围绕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产业等三大领域开展深入战略合作。

而作为国内首家发布“智慧城市”战略的电信运营商,湖北联通在 2012 年底与省政府签署了“智慧湖北”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建造一个覆盖面广、覆盖深入、承载力强、接入速率高的“智慧城市”网络。

●建设模式仍缺可持续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也都高度关注“智慧城市”概念。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廖仁斌认为,应正视智慧城市的问题,加快做好顶层设计,推动智慧城市又快又好发展,让老百姓早日分享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

廖仁斌指出,目前,许多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目的不够明确,思路不清晰,建设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实施推广难度大。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智慧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标准体系。

廖仁斌表示,智慧城市建设应突出重点和特色,以民生为导向,重点关注老百姓急需的智慧民生领域,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社保、智慧警务、智慧防灾、智慧社区、智慧校园等工程,其他智慧政务、智慧企业等领域同步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也发表观点称,我国智慧城市存在缺乏统筹、工业化思维主导、机制创新不足、产业拉动缺乏等问题,严重影响它的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应用和产业间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摸索确立。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在智慧城市的框架内还没有探索出一套统一的理论和标准体系,我国还没有完全掌握高端芯片和传感器新技术。信息化系统的智能化还很低,各种应用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底层层面。

总之,智慧城市服务民生衣食住行,除去概念化、蓝图化,切勿盲目模仿国外城市,需要定位清晰,设计合理,实施有效。

(来源:通信世界网)

智慧城市效应背后显发展难题